

A New Aspect of the Ancient Maritime Silk Road's Extension: The Rise of Macao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Global Silver Road

Wan Ming

Abstract: With globalization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development in history, the history of Macao also needs to be reconsidered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This is so because the rise and prosperity of Macao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a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that is, from the new way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the Silver Road. In the 16th century, globalization began from the sea, and a whole world was connected by the sea. At the beginning of globalization, the history of Macao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monetization of silver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germin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created Macao as the source of power and the axis of the remarkabl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centered on silver trade, which caused a worldwide movement of silver mining, development and circulation and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silver as the world currency as well as the flow of a large amount of global silver into China. Chinese goods were the fulcrum of the rise of Macao, and the spread of Chinese silk and porcelain to the world indicated that China ha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preliminary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howing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great convergenc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exchange of silk, porcelain and silver covered the whole world, and Macao served as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point for the global silver trading system that went 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its west through the Strait of Malacca, to the Pacific Ocean and even the Atlantic Ocean. The most direct and vital economic factor that caused the rise of Macao was the demand for silver in China and the flow of silver in international trade. China's demand for silver had generated enough impetus to maintain the operation of the entire Macao's global trading network. Around the silver trade, Macao was connected to a global economic trade system. With the rise of the Macao as a port city, the ancient Maritime Silk Road's extension showed a new aspect—the Silver Road also expanded to the world. The proposal of the Silver Road,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ilk Road, is undoubtedly of great benefit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Silk Road.

Keywords: rise of Macao, monetization of silver, system reform, the maritime silver road,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Author: Wan Ming received her master's in history from Peking University 1988 and became an expert receiving the State Council's special subsidy in 2010. She is currently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Ancient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 senior leader of the Summit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relations, a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Zhenghe Research Association. Her research field focuses on Ming history and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Her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Biography of Ming Taizu*, *China Walking into the Worl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Overseas Policies of the Ming and Early Qing*, *History of the Earl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al*, *Analects of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in the Ming Dynasty*, *Social 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Problems and Research* (Editor-in-chief and lead author),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n Accounting Records of Wanli in the Ming Dynasty* (lead author), and *Ancient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co-authored).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延伸的新樣態

——明代澳門興起與全球白銀之路

萬明



[摘要] 隨着經濟全球化與歷史學研究的新進展，澳門歷史也需要置於全球視野下重新考量。因為，明代澳門的興起和繁榮，是與海上絲綢之路新樣態——白銀之路——第一個全球經濟貿易體系的構建密不可分的。在16世紀，經濟全球化從海上拉開帷幕，一個整體世界從海上聯結起來。在經濟全球化開端時代，澳門史成爲經濟全球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明代白銀貨幣化，市場經濟萌發，成就了澳門作爲令人矚目的以白銀貿易爲中心的全球經濟體系的動力源泉和軸心所在，掀起了一場席卷全球的白銀開發與流轉的運動，推動白銀形成世界貨幣，促使全球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中國商品是澳門興起的支點，中國絲綢、瓷器等傳播到全球，標誌着中國積極參與了經濟全球化的

初步構建，顯示出經濟全球化時代大合流的歷史發展態勢。作爲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明代澳門與葡萄牙在東方的其他殖民地性質不同。葡萄牙人入居中國，也是中國皇帝的子民，在服從中國官府管轄的前提下從事海上貿易。沒有中國的政策、中國人的參與、中國的商品、中國的廣大市場及其需求，澳門就不可能興起。而作爲國際貿易中轉港的澳門，其興起、發展之初，就是中國商民與居澳葡萄牙人共同努力的結果。澳門跨越三大洲、三大洋的商業貿易網絡的存在，是澳門繁榮發展的主因。絲瓷與白銀的交換體系覆蓋了全球，澳門成爲西至印度洋穿越馬六甲海峽再到太平洋乃至大西洋，跨全球白銀貿易體系的一個重要聯結點。促使澳門興起最直接也是至關重要的經濟因素，是中國的白銀需求與國際貿易的白銀流動。中國對白銀的需求產生的動力，足以維持整個澳門聯結全球的貿易網絡的運轉；圍繞着白銀貿易，澳門聯結的是一個全球的經濟貿易體系。伴隨着澳門港口城市的興起，古代絲綢之路延伸的新樣態——白銀之路也擴展到全球。白銀之路與絲綢之路的密切關聯，無疑將擴展人們對世界文化遺產的認知。

[關鍵詞] 澳門 興起 白銀貨幣化 制度改革 海上白銀之路 全球經貿體系

[作者簡介] 萬明，1988年在北京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學位，2010年被選爲“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現爲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社科院“登峰戰略”資深學科帶頭人，兼任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會長、中國鄭和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從事明史和中外關係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明太祖本傳》《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中葡早期關係史》《明代中外關係史論稿》《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主編，第一作者）、《明代〈萬曆會計錄〉整理與研究》（第一作者）、《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合著）。

引言

“洋船石”是澳門著名古迹之一。進入媽閣廟，右邊有一塊巨石，上面刻有一艘古代海船，船的桅杆上掛着一面寫有“利涉大川”的幡旗（參見圖1）。此語出自《易經》六十四卦第十三卦“同人卦”：“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所謂“同人於野”，“同”是“會同”“和同”之意，可以解釋為，以“和同”精神會合同人於廣闊的曠野上；“亨”是一切亨通，引申為實現世界大同的理想。“利涉大川”，說明在大海上貿易利潤豐厚，無往不利；“利君子貞”，是有利於君子堅守正道。“洋船石”無疑揭示了澳門以海上貿易而興的重要特徵，也是澳門貿易“華洋”共建共生的真實寫照。



西方學者丹尼斯·弗林（Dennis O. Flynn）、吉拉爾德茲（Arturo Giráldez）認為，全球貿易誕生於1571年^①。然而，如果以中國活躍的白銀國際貿易為起點，時間可以提前到16世紀40年代。^②因為，16—17世紀上半葉，日本白銀產量的絕大部分和佔美洲產量一半的世界白銀流進中國，葡萄牙學者戈迪尼奧（Vitorino M. Godinho）因此將中國形容為一個“吸泵”^③。中國正是在全球化開端之時，通過澳門，積極參與了全球第一個經濟貿易體系的構建。這就關涉到全球史的重要篇章，即16世紀全球化開端後，海上絲綢之路擴展與延伸的新樣態——白銀之路的研究。

澳門興起於16世紀中葉，並非偶然。澳門開埠是明朝政策的產物，是明朝制度變遷的結果。明朝之所以開放澳門作為廣州外港、對外貿易特區，固然有多種因素，但白銀貿易是首屈一指的因素。迄今為止，中外學術界對澳門興起的政治、軍事、文化因素投入了相當大的關注，其實，對澳門生存和發展具有決定意義的是海上貿易，核心因素是白銀。^④鑒於此，本文旨在專門論證白銀貿易如何導致澳門興起，全球白銀貿易網絡的構建如何帶動澳門繁榮，澳門如何為海上絲綢之路再度輝煌——白銀之路發展到鼎盛時期——一個全球經濟貿易體系的誕生，即經濟全球化開端發揮了重要樞紐作用。

一 澳門的興起：白銀需求與制度改革

對於澳門興起的考察，需要回溯到中國經濟轉型的大背景——明代白銀貨幣化。

16世紀經濟全球化的前夜，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

在16世紀西方擴張東來之前的歷史時段，明代的白銀崛起於市場，它經歷了不同尋常的從非法貨幣到合法貨幣的進程，標誌着中國啟動了從農業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成化、弘治之際（1465—1505），明代中國白銀貨幣化由自下而上到與自上而下合流，主要以賦役折銀方式向全國鋪開。無獨有偶，這也正是鄭和下西洋時代海外物品胡椒、蘇木等在皇家府庫枯竭之時。當白銀成為全社會需求的貨幣時，中國銀礦卻出產不足，於是，民間私人海上貿易蓬勃興起。作為朝

① 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 “China and the Manila galleons”,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Asian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94).

② Wan Ming, *China's Silver Monetization: Ming China and Global Intera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7).

③ Vitorino Magalhaes Godinho, *Os Descobrimentos e a Economia Mundial* (Lisboa: Livraria Sa da Costa Editora, 1963), Vol.1.

④ 筆者以往的研究提出澳門開埠是明朝澳門政策的產物，也主要是從政治上論證澳門興起與明朝主權在握，對於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關係雖有所涉及，但對澳門生存和發展具有決定意義的海上貿易，卻主要集中於絲綢和瓷器，沒有凸顯貿易的核心因素白銀。參見萬明：“明代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世界歷史》6（1999）：2—8；“試論16—17世紀中葉澳門對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貢獻”，《文化雜誌》2（2002）：；“明代青花瓷西傳的歷程：以澳門貿易為中心”，《海交史研》2（2010）：42—55。

廷重臣的丘濬（1421—1495），關注到社會流通領域中的白銀凸顯，提出了以白銀為上幣，建言開放海禁，發展對外貿易。

在16世紀，海洋成為時代的主題：經濟全球化的大幕開啓，西方葡萄牙人東來，首先到達鄭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古里（今印度喀拉拉邦卡利卡特），接着沿鄭和航綫逆向到達鄭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滿刺加（今馬來西亞馬六甲），滅亡了滿刺加王國，佔據了馬六甲海峽的咽喉之地，於是直面中國。

西方葡萄牙舉國一致的海外擴張浪潮，推動着葡萄牙人來到東方；這恰逢明代舉國一致的白銀需求，推動中國國內市場大擴展，走向海外市場。明代白銀貨幣化進程，也是明朝財政貨幣化進程；白銀的需求，造成明朝財政危機愈演愈烈，制度變遷勢在必行。正當此時，正德十二年（1517）葡使東來，中葡官方第一次正式交往失敗，明朝在廣東“閉關”。此後，葡萄牙人與明朝私人海上貿易主體海盜兼海商集團合流，從事走私貿易，開始了侵擾中國沿海的過程。明朝在平息“海寇”侵擾過程中，經歷了廟堂之上爭議紛紜的階段，最終廣東地方政府在財政日益緊迫的壓力下進行制度改革，首創了澳門貿易特區：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允許葡萄牙人到廣東進行正常貿易；嘉靖三十六年（1557），允許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經營海外貿易。至此，中國商民和工匠“趨者如市”^①，澳門作為國際貿易重要港口城市應運而生^②。葡萄牙人入居澳門，還與其助剿地方海盜有着密切聯繫。^③海盜事件的屢發與平息，不僅具有軍事和安全意義，無疑也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

此時，由於白銀貨幣化在全國鋪開，財政貨幣化加速進行。至嘉靖初年，白銀在流通領域的主導地位確立，海上貿易以民間海盜兼海商為主體走向東亞海域，這直接促進了日本銀礦的大開發，也使得海上貿易的無政府、無秩序達至歷史頂點。為清晰瞭解葡萄牙人被逐出廣東到入居澳門的戲劇化轉變，這裏試將相關大事按年排序：

嘉靖二年（1523）寧波“爭貢之役”發生，血流成河，“朝貢貿易”由此步入尾聲；葡萄牙人在被逐出廣東後，與中國海盜兼海商合流，在浙江舟山雙嶼建立居留地。

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朝巡撫朱劼蕩平海盜基地雙嶼；之後，朱劼下獄，中外不敢言海禁。

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盜兼海商王直等人，大肆劫掠浙江沿海。

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俺答南下逼京師，史稱“庚戌之變”。“南倭北虜”促發明朝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嘉靖二十八年，太倉歲入銀212萬兩，歲出卻達412萬兩，一出一入相差近一半；嘉靖三十年（1551），太倉歲入200萬兩，歲出竟達595萬兩，差額幾超歲入的兩倍。^④由於“倭寇”騷擾主要集中於浙、直、閩、粵等沿海地區，明朝開始提編加派，於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等遭受倭患的沿海省份實行派向人丁或田地，預徵銀力二差，民壯、弓兵、里甲折銀等，力圖補充海防經費。

嘉靖三十二年（1553），王直糾集中日海盜兼海商大肆劫掠浙江沿海，所謂“倭寇之患”大熾。

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明朝於次年提編預徵三十五年各處民壯、弓兵和均徭折銀，送軍門充餉。^⑤在此倭患愈演愈烈、軍事開支急劇增加、里甲承擔的賦役更為沉重、“防倭禦倭”局勢緊

① [明] 陳吾德：《條陳東粵疏》，《謝山存稿》（清乾隆五十四年忠直堂刻本，1789），卷1。

② 對於中葡第一次正式交往失敗，發展至中葡衝突在華南，再到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的經過，明朝對澳門政策與治理形態，澳門成為中外交往的視窗，參見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第24—169頁。

③ [明] 韓霖：《守圍全書·委黎多報效始末疏》記云：“迨至嘉靖三十六年，歷歲既久，廣東撫按鄉紳悉知多等心迹，因阿媽等賊竊据香山縣濠鏡澳，出沒海洋，鄉村震恐，遂宜調多等，搗賊巢穴，始准僑寓濠鏡。”這裏清楚地記載了嘉靖三十六年葡人助剿澳門海盜而獲得澳門居住權。參見湯開建、張照：“明中後期澳門葡人幫助明朝剿除海盜史實再考”，《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2005）：192—197。

④ 全漢昇、李龍華：“明中葉後太倉歲入銀兩的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1972）：136—139。

⑤ 《明世宗實錄·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乙亥》（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卷417。

張之時，葡萄牙人助剿廣東海盜何亞八。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廣東海道副使汪柏與葡萄牙船長蘇薩訂立口頭協定，允許葡萄牙人入廣州貿易，其時“資貿易以餉兵”的目的極為明顯。

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助剿澳門海盜，“始准僑寓蠔境”，廣東地方政府允許葡萄牙人入居澳門。

需要說明的是，直到明朝滅亡，澳門也祇是允許葡人居留進行貿易的特殊僑民社區；至於葡萄牙人全面佔據澳門，則是清代鴉片戰爭後的事情了。在明代，廣東政府官員利用澳門設立貿易特區，引進外商經營海外貿易，從事白銀商品的進出轉口貿易，增加稅收收入，充實財政收入，是制度改革的產物，澳門因此成為中國境內唯一允許外國人居留和貿易的特殊區域。正是在這一新格局下，澳門纔不同於當時中國的其他港口城市，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發揮了特殊作用。這一重要地位主要體現在，提供外銀的輸入，助推中國商品向海外輸出，中國通過澳門參與了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至此，澳門這一重要商港，在葡萄牙人獲准在廣州進行一年兩次的貿易之後，成為中國白銀進口的重要來源。

二 澳門的繁榮(上): 中國與全球白銀之路的建構

明代澳門興起繁榮的近九十年歷史(1557—1644)，實質上也是明朝制度變遷的歷史。明代中國從傳統農業經濟轉向近代市場經濟的過程，是一個貨幣經濟增長的過程；增長的動力來源，始於明代白銀從市場自發崛起及其貨幣化進程。澳門貿易的興起，具有中國市場經濟萌發和市場繁榮的歷史大背景。在市場經濟發展推動下，明朝採用的是漸進的制度變遷方式，把自下而上來自市場的調整與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遷結合起來。從朝貢貿易體制向自由貿易體制轉變，一個重要的關節點就在澳門興起。從官方主導的朝貢貿易轉向開放市場貿易，把對外開放與地方財政體制改革有機結合起來，澳門作為廣州外港的興起，標誌着明代中國白銀經濟步入通往全球貿易的新常態。

明代經濟的轉型，推動了嘉靖後期的對外政策轉變，開啓了新的海上貿易模式：一是在福建漳州月港開海，允許中國商民出洋貿易；一是在廣東澳門開埠，引進外商入華經營海外貿易。從前者來說，月港開海孕育了福建海商合法化及其集團的崛起，到萬曆末年，中國海商集團迅速成長壯大，成為17世紀西太平洋海上貿易的主體力量。從後者來說，澳門開埠意味着引進外商經營海上貿易合法化，形成一個貿易特區。值得注意的是，澳門形成廣州外港——貿易特區，自一開始就是中國海商與居澳葡人共同努力的結果。中國商品是澳門對外貿易的支點，新的對外貿易模式的轉變使一種新的全球貿易網絡開創運行。從此，以澳門為中軸，與海外建立多條國際貿易航綫：澳門—果阿—歐洲；澳門—日本；澳門—馬尼拉—美洲；澳門—東南亞。基於中國的特殊國情——白銀貨幣化，澳門興起後作為海上國際貿易網絡樞紐，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極大地延伸——白銀之路擴展到全球。

為了開展海外貿易，明朝推出了允居澳門的政策，將其作為擴大財源的手段；而從白銀貨幣化出發，則會發現，由此產生了諸多值得關注的經濟現象和問題。其中，澳門的興起，在龐尚鵬的疏中，表述為“築室以便交易”^①；在霍與暇的議中，直接提出“資貿易以餉兵”^②，明確希望通過以這種方式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在嘉靖十四年(1535)戴璟《廣東通志初稿》的“嘉靖十三年會議糧價則例”中，全省各府縣的米糧與軍餉均已以銀計，可見廣東財政貨幣化走在了全國前列。^③制度改革的特點是：其一，改變了朝貢貿易體制的則例。其二，以允居方式讓納稅者葡萄牙人在澳門經營海上貿易。澳門由此形成一個龐大的全球經濟貿易體系的中軸，反映了東西方

① [明]龐尚鵬：“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疏”，《百可亭摘稿》（清道光十二年刻本，1832），卷1。

② [明]霍與暇：“呈揭·處濠鏡澳議”，《霍勉齋集》（清咸豐七年刻本，1857），卷19。

③ [明]戴璟、張岳等纂修：《（嘉靖）廣東通志初稿·田賦》（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卷23。

對於海上貿易的合理訴求，澳門發生以及由此導致的白銀需求和貿易模式的變化，加速了明代中國與全球白銀貿易體系建構的互動關係，推動了明代國家與社會的轉型。

這裏還有一個匡正舊說的問題。中外史學界在談到澳門海上貿易時，大多祇談葡萄牙人建立並經營了以澳門為中心的多條國際貿易航綫，即葡萄牙人開展了澳門國際貿易。與之相聯繫的，是認為自葡萄牙人東來後，海上絲綢之路就發生了自東而西向自西而東的轉向。但是，置於全球史發展進程中來看，在15世紀，人類大規模海洋活動帷幕揭開，世界性新航路開通，代表了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全球經濟開始融為一體。以享譽世界的中國絲綢命名的“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與海外各國交往的海上紐帶。葡萄牙人東來，中國明朝政府的政策轉變，澳門以白銀貿易而興起，促使“海上絲綢之路”極大地擴展和延伸，形成了新樣態——白銀之路，與世界市場的初步形成同步發生，從而推動了全球融為一個整體的進程。

拓寬研究時空範圍，以往成定論的觀念就暴露出問題。首先，從歷史發展脈絡看，在中世紀，中西經濟關係本是不平衡的，中國先進，西方落後；即使是葡萄牙人東來，在中國與西方直接交往的開始時期，也沒有立即改變這一狀況。所以，不能想當然地認為，自西方人一東來，中國就落後了。因為，中國明朝在當時是一個龐大的文明古國，而此時的歐洲尚拿不出能與東方抗衡的商品。中國傳統的絲綢、瓷器等商品仍獨步世界，仍舊在東西方交往中佔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其次，當時的海上絲綢之路也不能簡單地視為西方海外擴張的工具。因為，中國在當時並沒有落後於西方，也不是被動地納入世界市場的。從亞洲國際貿易自古已經存在而言，絲綢故鄉在中國，白銀需求自中國始，葡萄牙人祇是一個加入者。所以，“絲路”並不存在自西而東的轉向問題。其實質是，中國通過澳門這一輻射地，使海上白銀之路得到了極大擴展，積極參與了世界第一個經濟貿易體系的構建。

從澳門所起的歷史作用來看，它是中國領土，不同於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儘管葡人的經營在澳門國際貿易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是重要和顯而易見的，應予肯定，但對澳門國際貿易及其歷史地位需要作整體評價，不能僅着墨於葡人的經營，澳門的興起和發展、地位和作用都不能撇開它是在中國的坐標系上這一關節點而孤立看待。澳門作為海上貿易港口城市的迅速興起是內外動因促成的，但內因是主導因素。是中國內部自發的經濟轉型形成了巨大的白銀需求，促發了澳門興起，推動着中國走向全球。

三 澳門的繁榮(下): 海上白銀之路擴展至全球

澳門是以國際貿易重要中轉港的面貌出現的。葡萄牙人開展的國際貿易，是一種轉運貿易，這已是國內外學術界的共識。在東方，葡萄牙人建立了貿易網，轉運貿易的重要支點之一是澳門。葡萄牙人進行的中介貿易，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輸入海外的貨物，二是輸出中國的貨物。前者要保證有中國的市場，後者則完全依靠中國的商品經濟發展。事實上，葡人是憑藉中國的商品和市場立足的。澳門的興起及其貿易發展，具有明末中國白銀經濟和市場發展的歷史大背景；而澳門國際貿易的支點是中國商品，是中國傳統的絲和瓷等產品。16—17世紀中葉，憑藉廣大中國腹地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和活躍的國內市場，澳門作為明朝對外開放的一個視窗和廣州的外港，很快發展成爲一個國際貿易中心，從而使海上絲綢之路得到了空前發展，白銀之路聯結起了全球。

明代後期，中國社會有對白銀的巨大需求，但國內礦產資源明顯不足，故從海外輸入便成爲白銀的一個重要來源。作為中國商品輸出的中心輻射地，以澳門為中心，開闢了多條國際貿易航綫。中國的生絲、絲綢、瓷器等商品從澳門大量出口，經由果阿銷往歐洲，通過長崎銷往日本，也經馬尼拉銷往美洲西班牙殖民地，而中國商品換回的是大量白銀。

(一) 澳門—果阿—歐洲

在以澳門為中心開闢的多條國際貿易航綫中，澳門—果阿—歐洲航綫是重要的一條。作為

廣州的外港，澳門以中國商品和市場為依託迅速興起，由此中歐貿易成為中外貿易的重要內容之一，而澳門也成為中歐貿易的中軸。澳門經果阿運往歐洲的商品，主要是中國的生絲、絲綢、瓷器、藥材等，同時大量白銀也通過這條綫路流入中國。17世紀初，葡萄牙人由里斯本經果阿運送了大量白銀到中國。萬曆十三年至十九年（1585—1591），每年自果阿運到澳門的白銀約二十萬兩^①。萬曆二十九年（1601）有三艘葡萄牙船自果阿來到廣州，“舟各齎白金三十萬，投稅司納稅，聽其入城與百姓交易”。^②據估算，自葡萄牙運銀到果阿，大約升值三分之一，而如果經果阿運到中國購買貨物，就可升值約70%以上。^③為了獲得巨額利潤，葡人使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換取中國的商品，使中國在中歐貿易中長期處於順差的有利地位，對明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二）澳門—日本

日本是中國外來白銀最早的來源地。在與日本的貿易中，大量的中國生絲和絲織品換回的主要是日本的白銀。金國平、吳志良曾對葡萄牙人首次到達日本的時間做過新的考察，最後通過兩種日本方志的明確記載和對葡萄牙文所提供的日期進行推論，確定了葡萄牙人第一次到達日本的時間為1541年，地點是豐後。^④自1541年葡萄牙人到達日本豐後（今日本九州大分縣北），葡萄牙人自此開始前往日本貿易，這種貿易航行幾乎沒有中斷。直到1639年，纔因日本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被迫停止。

據統計，1580—1597年間，葡人從日本運出了750萬—890萬兩白銀。^⑤1601年，葡船從日本長崎運到澳門的白銀高達100萬兩。^⑥日本的白銀運到澳門，成為進行循環貿易的資本，大部分投向了中國市場，以換取中國的生絲和絲織品等商品。如此周而復始的絲綢輸出和白銀輸入，澳門—日本這條貿易航綫賴以生存，澳門賴以興盛，而中國國內商品經濟和市場也賴以繁榮發展。

1589年7月28日，耶穌會巡視員神父范禮安（Alessandro Vilignano）在澳門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說：“這一航海極為有利，經費交易可以獲得超過40000杜卡多的收益，但如果不在規定的年份中進行航海，就會喪失這一權利。航海通常每年不缺的進行，它給澳門本市及其居民帶來幫助，因為除了利用這一航海，由中國本港送往日本的商品中獲得收益之外，澳門市沒有固定資產與救濟方法。這裏的居民除了建於本港的房屋之外沒有其他不動產，他們作為外國人居留在中國人的土地上，他們除了從這一貿易中獲得利益之外一無所有，所以每年將自己的貨物裝上被賦予這一航海的上述貴族的船上。這一航海的開啓已經超過了四十年，沒有一年不進行航海的。或者由於上述理由，不得不進行航海。”^⑦據此，由澳門前往日本的貿易航綫，幾乎就是澳門葡萄牙人賴以生存的生命綫。澳門的生存主要依靠的是澳日貿易，即白銀貿易是澳門居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由於信中稱，貿易的開啓已經超過了四十年；那麼，也就是說，是從16世紀40年代開始的，即葡萄牙人到達日本以後立即就開始了。

（三）澳門—馬尼拉—美洲

美洲白銀，是中國外銀的第二個來源地。中國絲貨輸出到馬尼拉，又立即被馬尼拉大帆船運往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由此，在太平洋上形成了一個大三角國際貿易網絡。通過這一網

①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a: Centro de Estudos Historicos Ultramarinos, 1963), 7. 原文是20萬克魯扎多，一克魯扎多約等於一兩白銀。

② [明]王臨亨：《粵劍編·志外夷》（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91頁。

③ Bal Krishna,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England 1601-1757* (London, 1924), 44-45.

④ Jin Guo Ping and Wu Zhiliang, “Nova Tradução de Teppōki (crónica da espingarda)” *Review of Culture* 27 (2008), 7-20.

⑤ George Bryan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56.

⑥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64.

⑦ 《耶穌會與日本》，第1卷，第56頁；轉引自戚印平：《耶穌會士與晚明海上貿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第184頁。

絡，中國絲綢源源不斷地運往美洲，傳統的絲綢之路有了新的擴展。在絲綢、瓷器輸出美洲的過程中，除了大量發自福建的中國商人商船外，澳門也是一個主要渠道。特別是葡萄牙人對美洲運往歐洲的白銀也轉運中國，實現的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全球貿易。

早在1530年，西班牙人已在墨西哥的蘇特庇克和朱姆帕戈發現了銀礦；之後，又在薩卡特卡斯（約1540年）、瓜納托（約1540年）、帕丘卡（1552年）、索姆博雷特（約1558年）、桑塔巴伐拉（1567年）、聖路易波托西（1592年），以及秘魯的波爾戈（1538年）、波托西（1545年）、奧魯洛（1606年）等地發現了銀礦。^①因此，西屬美洲當時可以用來交換中國絲綢的正是那裏的白銀。於是，大量美洲白銀流入了中國。根據估計，1585年以前，每年大約是30萬比索；1586年，50多萬比索；1590年，100萬比索；1602年，200萬比索。^②而在澳門與馬尼拉貿易的興盛時期，即自1620—1644年的二十四年間，澳門到達馬尼拉的船總數是五十四艘，其中1627年一年多達六艘。^③到1630年，澳門運往馬尼拉的貨物大約價值是150萬比索。^④沿着這條航綫，中國的絲綢獨步於太平洋上，因此，這條航綫又稱作“太平洋絲綢之路”。

（四）澳門—東南亞

16—17世紀中葉，當大西洋貿易明顯呈下降趨勢時，正是橫跨太平洋的中國與菲律賓及美洲貿易，西太平洋中國與日本、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構成了全球貿易市場中最為活躍的部分；^⑤而澳門到東南亞的航綫，也有少量的白銀輸入中國。由於這些貿易活動都是以中國絲綢、瓷器等產品為重要貿易品進行的，作為國際貿易中轉港的澳門，就成為了中國絲綢、瓷器等商品的輻射地，促使海上絲綢之路極大拓展；而中國以絲綢等商品在世界佔有的優勢地位，也對世界市場形成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總之，澳門國際航綫的開闢，海上絲綢之路的延伸，形成全球白銀之路，是建立在中國明末市場經濟和商品市場蓬勃發展的雄厚物質基礎之上的。澳門成為遠東國際貿易的一個中心輻射地，是明代中西遇合產生的迸發力，是中國與西方直接交流的結晶。澳門作為廣州國際貿易的重要門戶，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中轉港，與生絲出口、白銀進口的明代外貿模式緊密聯繫，與珠江三角洲商品經濟迅速發展有着互動作用，更是中國參與全球第一個經濟貿易體系建構的進程。沿着白銀之路擴展到全球的航綫，沿綫的節點城市與地區，已有許多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如印度的果阿、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日本的石見、菲律賓的馬尼拉、越南的會安、墨西哥的瓜納托、玻利維亞的波托西、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爾維亞等；也有至今還未列入的，如當年白銀之路上著名的墨西哥阿卡普爾科等。這裏試舉三例與白銀之路有關的世界文化遺產：

其一，日本的石見銀山遺迹及其文化景觀。位於日本本州西南部的島根縣，是16—20世紀開採和提煉白銀的礦山遺址。現存有將銀礦石運輸至海岸的山道運輸綫，以及當時運輸銀礦的港口城鎮鞆浦、沖泊和溫泉津。這裏開採的大量白銀，大大促進了16—17世紀日本和全球經濟的整體發展。200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其二，玻利維亞的波多西城。位於安第斯山脈賽羅里科山下，現為波托西省首府。1544年，波多西被發現盛產白銀，城市於1545年4月10日建立起來，大規模的白銀開採也隨之展開。很快，第一批白銀被裝船運往西班牙。由此，城鎮人口也迅速增長，迅速成為當時拉丁美洲乃至世界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其三，墨西哥的瓜納托城及周圍礦藏。位於墨西哥瓜納托州，1529年屈從於西班牙的統治。

① 陸國俊、金計初 主編：《拉丁美洲資本主義發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第4頁。

② E. H. Blair and J. Robertson,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Clifland: The Arthur H. Clark Co, 1903-1909), Vol.6, 269; Vol.10, 179; Vol.16, 178; Vol.25, 143-144.

③ George Bryan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75.

④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132.

⑤ 張鏜：“晚明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中國史研究》3（1988）：3—15。

之後，該地陸續發現四個銀礦——邁非爾、特佩塔帕、聖安娜、塞羅德爾華托，西班牙人立即在各銀礦周圍修建防禦工事、據為己有。因此，始建於1548年的瓜納托城就是由這四個銀礦區組成；到18世紀時，發展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銀礦開採中心，現存的“地獄之口”礦井深達600米。198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結語

如果沒有經濟全球化前夜明代中國的白銀貨幣化，就沒有澳門的興起；如果沒有經濟全球化開端時中國的對外貿易制度改革，積極參與全球第一個經濟貿易體系的建構，也就沒有今天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

一方面，是葡萄牙舉國一致的海外擴張要求，促使葡萄牙人來到東方，促成了澳門的興起；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方面，是中國本土舉國一致的白銀需求，成就了澳門興起與海上白銀之路。

從1554年到1644年這近九十年間，是澳門興起發展的黃金時期，澳門成為一個極為繁盛的國際化貿易港口城市。通過澳門，中國積極參與了全球經濟貿易體系的建構。澳門的興起在明代，澳門的黃金時代也在明代，但這並非是葡萄牙單方面經營海上貿易的功績。因為，明代居澳葡人祇是中國廣東政府管控下的一個葡萄牙僑民社區，他們開展全球貿易活動，明朝政府給他們以稅收優惠政策，建立了澳門貿易特區。

這場制度變遷是從傳統朝貢貿易體制向近代市場貿易體制的轉型，是以官方朝貢貿易為主體向民間海商為主體轉變，也是貿易以單一官方為主體向以多種經濟組織並存轉變，它經歷了從單一朝貢體制到允許私人海上貿易存在、再到中外合作並進的歷程。澳門興起是漸進式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直至張居正財政改革，明朝纔發生了突進式改革，澳門治理模式也纔最後確定下來，使得白銀國際貿易運行形成常態發展狀況。

澳門跨越三大洲、三大洋的商業貿易網絡的存在，是澳門繁榮發展的主因。絲瓷與白銀的交換體系已覆蓋了整個全球，澳門成為西至印度洋穿越馬六甲海峽再到太平洋乃至大西洋，跨全球白銀貿易體系的一個重要的聯結點。促使澳門興起最直接也是至關重要的經濟因素，是中國的白銀需求與國際貿易的白銀流動。中國對白銀的需求量產生的動力足以維持整個澳門連接全球的貿易網絡的運轉，圍繞着白銀貿易澳門聯結的是一個全球的經濟貿易體系。重要的是，澳門港口城市的興起，將古代絲綢之路延伸的新樣態——白銀之路擴展到全球，中國積極參與了世界第一個經濟貿易體系構建，為經濟全球化開端做出了歷史性貢獻。在全球視野下探討明代澳門在經濟全球化開端時期的興起，以及它在推動海上白銀之路發展到鼎盛時期的歷史地位與作用，可以為今天中國“一帶一路”實踐和參與全球治理提供有益的啟示，也將擴展人們對世界文化遺產的認知。

〔作者註：本文原是2019年11月參加國家文物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召開的“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發言，應《南國學術》編輯部之邀，現整理補充發表於此。〕